

第肆章 哲學基礎與思想關懷

如果你不把那些支配你的思想的先決觀念翻出來見見亮光，那你遇事就會成為其時其地正統觀念的囚犯。你所處的那個時代、那個年代的模式，就會在你渾然無知的情況下成為禁錮你的思想的牢籠。¹

顧準的思想在埋沒了近二十年後終於受到知識界的普遍關注，並且帶給歷史學、政治學與哲學領域的權威理論以沉重的衝擊，究其因在於他把當時已演變為主流意識的、被人們做為信仰而接受的理論，還原為經驗性的客觀知識，並拿歷史的事實來檢驗這些理論的真理性。1992年由香港三聯書店所出版的顧準遺著——《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該書書名便清楚說明了顧準思想變化與突破的歷程，正是因為他走出了建立在唯理主義之上的理想主義，形成了經驗主義的世界觀，指出當下需要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經驗主義地解決現實問題。顧準的經驗主義世界觀有兩個核心內容：一是多元真理觀，二是進步的信仰。²由於憑藉著多元真理觀，顧準斷然否定了終極目的和一元主義，認為這樣的觀念教條只會導向唯我獨尊的政治權威主義；同時，依藉著進步的信仰，顧準才有勇氣在逆境中保持一種理想主義情懷，³獨自堅持理論探索和思考。此外，顧準所有思想探索的目的都是在重新審視「革命」，其著力點並非「中國要不要革命？」的問題，而是「革命後該怎麼辦？」的問題，亦即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應該實行何種經濟體制與政治制度？要之，顧準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命題，是他之所以在中共建政後仍力求探索的終極關懷與原動力。

¹ 麥基 (Bryan Magee) 著，周穗明、翁寒松、譯坊譯，《思想家：當代哲學的創造者們》（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 51。

² 陶東風，〈挖掘專制主義的學理依據與人性根源——從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說開去〉，《開放時代》（廣州），1996年第3期，頁 42-45。

³ 由顧準的思想流變觀之，雖然他主張要放棄激情的理想主義，走向平靜的經驗主義和多元主義，但並不代表他就此徹底否定了理想主義。他否定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進而主張一種去除了烏托邦幻想的理想主義。參見：顧準，〈辯證法與神學〉，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頁 289-307。〈辯證法與神學〉另收錄在顧準著，《顧準文稿》（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 435-456，篇名則改為〈哲學雜談〉。

第一節 思想變化與突破：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1952年三反運動的撤職與1954年洛陽工作的受挫，對此，顧準的心情煩亂且心有不服，但仍然沒有使他對自己所信仰的革命理論進行深入的反思，而只是認為「黨內沒有民主」，⁴對於革命事業和理念，他仍抱持著樂觀的信念和期待。因此，當顧準在1955年9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時，一開始是心存「申訴委屈和解決問題」的想法，⁵即試圖解決個人與組織間的衝突問題，再來看自己未來在實際工作中是否仍有大展鴻圖的可能。易言之，1950年代顧準在政治道路上的屢次落馬，並沒有因此阻斷他對革命事業的嚮往，最多只是促成他進行理論學習、研究與反思這一志趣的轉向。

若從顧準日記所記載的關於自身思想觀念、理論知識的變化來看，在黨校的學習時期，是顧準從事理論反思與批判的開始。由於他對反教條主義的信念，開啓他挑戰當時位居主流的一元主義框架，進而產生對辯證法的質疑。檢視顧準的《黨校日記》，「教條」、「教條主義」的不斷出現以及對於它們的否定態度，說明在顧準的思想觀念當中，有著極強烈的反教條主義精神。一直到1957年顧準被打成右派時，他都堅持這樣的信念，其中可以歸納成兩個特點：一是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真理，教條主義則是非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的對立面；二是認為教條主義中的教條，乃非源於經驗且脫離實際的教條，其與本本主義無異。⁶換言之，在顧準眼中，任何一個理論、政策、方法乃至一個人的思維方法和做事風格，如果是教條的，那麼它就是錯誤的，是與真理相悖反的。因此，他在日記裡指出，中國大搞工業建設，照搬蘇聯方案與計劃，凡事以蘇聯為標準，是「經濟建設上的教條主義」；當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提倡要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說經典著作才靠得住，顧準對這樣的比喻「聽來很不入耳」，認為一切對當前經濟的研究都照搬欽定的理論規律，不過是「陳腐的教條理念」，「學風至於如此，與僧侶主義何異！」⁷

基於反教條主義的理念，不僅使顧準擁有挑戰史達林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勇氣，同時也開啓他對馬克思理論中辯證法的懷疑。進入黨校學習不久，顧準心中對於辯證法產生了懷疑：「過去幾天存在過死結，為什麼應該如此肯定矛盾，如此肯定質量互變，如此肯定否定之否定，特別是形式邏輯，提供了不少反面的論據。」⁸由於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核心，顯然，顧準的疑慮是：如此無條件地肯定辯證法是不是也是理論上的教條主義？但過沒幾天，顧準就消除

⁴ 顧準，《顧準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315。

⁵ 顧準，《顧準自述》，頁225。

⁶ 顧準，《顧準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6-98。

⁷ 顧準，《顧準日記》，頁28-29、45-46。

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6-7。

這樣的疑慮，他說：「解決的方法是矛盾論……辯證法本來是否定教條的，辯證唯物主義絕對肯定的東西只是根本問題與反映論觀點，只是認識的相對性及其無限發展的可能，一切獨斷主義是別人加上去的東西，不能由他們來負責。」幾天以後，顧準又「再一次確認，馬列主義不是教條。正因馬列的辯證法理論不僅不阻擋新東西的產生，而且肯定新東西吸收了舊東西的一切積極因素。」如此一來，馬列主義就成了「徹底的歷史的科學的真理論，才能在具體的個別的方法的結論中反對教條主義，也只有如此不允許教條主義有滋長之所。」因此，當顧準得出此一結論時，他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心情：「發生了入學以來從未有過的興奮情緒。」

分析顧準的哲學觀由理想主義轉變為經驗主義的發展歷程，1955 到 1956 年在黨校學習的這一年可以說是思想轉變的萌發期。誠然，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理論核心要旨，顧準的理論反思一開始便直指核心，但因其反思所依仗的僅僅是反教條主義理念，在仍舊把馬克思理論視為唯一真理的前提下，這樣的反思自然無法形成理論上的力量。

迫使顧準繼續進行理論反思是 1957 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以後，這次顧準反思馬克思理論所依恃的，不再純粹只是如何看待理論的態度—反教條主義，而是用歷史事實這一放大鏡來檢視、證偽馬克思理論的真理性。從 1957 年 8 月到 1958 年 5 月這段期間，顧準除了必須應付針對他右派錯誤的批判會之外，大多時間都是閉門讀書，除了讀馬恩列斯的著作，還讀了一批西方歷史的書籍。⁹且早在黨校學習時，顧準就已開始大量閱讀歷史書籍，並認為：「讀歷史不是無用的，嚴格的歷史眼光，會大大提高客觀冷靜的成分。」¹⁰值得一提的是，顧準在黨校的 1956 年 3 月 22 日的日記裡，就曾注意並記錄下一個有趣的歷史現象，他說：「除了德捷兩國而外，社會主義世界其他各國都是落後國家，其中自國革命運動獲得勝利的中蘇兩國，都是民主革命緊跟著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說勝利以前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化的時期。反過來，一切資本主義獲得了勝利的國家，還沒有一個自力獲得了勝利的。」¹¹由此觀之，顧準針對這一現象的發現應是：歷

⁹ 顧準，《顧準自述》，頁 250。

¹⁰ 顧準，《顧準日記》，頁 44-45。

¹¹ 顧準，《顧準日記》，頁 61。顧準這段話的意思是指，若按照 1930 年代蘇聯史學家根據他們所誤解了的馬克思思想而構造的五階段社會發展公式：「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社會（共產）主義制」，其中表明社會主義社會將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成熟之後接續到來，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因已歷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照理都應該具備一定的經濟發展程度。然而，顧準在此指出三個矛盾的現象，上述歷史公式明顯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首先，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當中，除東德與捷克外，其他國家多是經濟程度落後的國家；再者，對憑一己之力推翻原先政府、創立共產政權的蘇聯和中國而言，這兩國在沒有完備的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之前，即逕行跳過資本主義階段來到社會主義階段；最後，在當今的資本主義陣營內，迄今仍沒有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甚至革命成功而推翻原先政權的國家。此外，何新亦針對上述現象提出兩點批判，第一，自中共建政以來的中國史學界試圖盡可能地削足適履、扭曲、刪改、修正中國歷史，以便把它塞進上述歷史公式的框架內。第二就是在「歷史規律」的名義下，將這個公式神化成不允許懷疑和批

史進程並不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規律——歷史階段論發展過來的，而英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按照其預想的模式過渡到社會主義。不過，當時的顧準並沒有繼續深究下去，而只認為「一切這些問題，應當花費極多的勞動來解決它。」¹²

然而，當時序來到 1957 年，就在顧準閉門讀書的這段期間，他又重新省思過去曾察覺但未深究的這個問題。這次，他的提問方式是：馬克思的預言為何沒有在英國等發達國家中成為歷史？如果按馬克思的社會發展論，社會主義應該最早在英國等發達資本國家中實現的，但顯然馬克思的設想失效了。他說道：「馬克思的預言第一個失敗是在英國，第二個失敗是在德國……歷史違反了馬克思的預言。」基於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源於歷史唯物論，且其又緣自唯物辯證法的邏輯演繹，如今以歷史事實為明證，顧準遂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把馬克思的辯證法作為一個普遍命題是不對的。」此時，他的思想出現重大的轉折，內心更面臨兩難掙扎：「理論問題並未獲得解決，到底是非跟馬克思主義的基調分手？還是仍舊可以服從這個基調？敬重馬克思、恩格斯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是近代思想界和科學界的偉人，一點也不能懷疑。問題是他們的預言與實際距離太遠了，雖然他們的理論給人們以巨大的勇氣。」¹³顯然，透過歷史事實的證偽，顧準在世界觀上已經突破過去把馬克思理論奉為一元的絕對真理的思想狀態。

從顧準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顧準即開始對支撐其革命理想的理論產生懷疑，雖然他很快地又重新認定，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視為真理。而在 1957 年被劃為右派之後，顧準因個人政治上的失敗遭遇又再度反思：所處的組織與社會是否有問題？支撐組織與社會的理論本身是否有問題？儘管，此時顧準在思想上的突破仍停留在基於歷史事實所做的判斷，但因歷史事實屬於經驗範疇，自然也為顧準之後走向經驗主義起了銜接作用，透過歷史來決定理論的真偽，從而否定了原先所信仰理論的真理性，至此，象徵顧準已然告別理想主義，並且在其思想歷程中探索、理解經驗主義的核心理念。

顧準對於哲理邏輯的梳理是在 1959 年以後繼續進行著的。從顧準的日記觀察其思想活動，自 1959 年 3 月起，他陸續找了許多哲學經典著作來閱讀，其中包括黑格爾（G. W. F. Hegel）的《小邏輯》、羅素（Bertrand A. Russell）的《哲學中的科學方法》、汪奠基的《現代邏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的《科學與

評的神聖教條。何新遂讚揚顧準的遺著《希臘城邦制度》，是試圖超越和突破過去這種歷史公式主義的著作。參見：何新，〈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從近年出版的兩部史書看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讀書》（北京），1986 年第 11 期，頁 40-51。

¹² 顧準，《顧準日記》，頁 62。

¹³ 顧準，《顧準日記》，頁 100-101、106。

唯心主義的對立》、杜威(John Dewey)的《哲學的改造》和羅素(Bertrand A. Russell)的《自由與組織》等書，並且在日記中記錄下閱讀這些著作之後的心得：

我寧願放棄一個統一的宇宙的看法，尊重各別科學的各個方法。一個唯物論的前提我是接受的，但這個前提必須是列寧式的不附任何圖案的……

歷史唯物主義的公式不足以解釋全部歷史，比如中國大躍進的動力它就無法解釋。歷史唯物主義隱含著一個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前提 - 存在一個必然規律，這個必然規律向著共產主義的完成。我接受經濟學的分析，但拒絕黑格爾式的圖式。黑格爾的圖式實際是未脫離宗教氣味，……所以辯證唯物主義前門拒絕形而上學，卻從後門把形而上學的範疇——偷運進來。¹⁴

過了幾天，顧準在讀完經驗主義大師杜威與羅素的著作之後，又寫下這樣的充滿激昂語調的文字：

我是不能從黑格爾那裡找到哲學的解答的，我看到那個絕對就頭痛。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天國。對於未來的瞻望，必肇始目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目前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的對未來的預言。……絕對主義 - 專制主義，原是與辯證唯物主義有血緣關係的東西，這是不可以忍受的東西。

15

從上面兩段文字，顧準透過閱讀大量的經典哲學著作，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他們前代、同代、後代的哲學家、思想家的種種學說進行精細縝密的研究和比較後，對辯證唯物主義既提出了哲學的質問、也提出了科學的質問。首先，由於馬克思理論在知識論上，屬於與經驗主義相對立的理性主義，而在認識方法

¹⁴ 顧準，《顧準日記》，頁 118-119。

¹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0。

上，理性主義認可的是自明原則和演繹法，經驗主義強調的是經驗原則與歸納法。顧準在梳理過自身對於哲理的認知後，更進一步地否定了與辯證法共生共存的理性主義，並且認為辯證法是革命的但不是科學的。¹⁶再者，既然顧準引用歷史事實去否定馬克思理論中的辯證法及其真理性時，就也代表他已認同經驗主義的主張。正如他所讀過杜威的《哲學的改造》一書，杜威在書中提出，人與動物的不同就是因為人能保存經驗，並指出經驗的方法——歸納法是促進現代科學發展的科學方法，經驗主義者往往是反教條主義者、強制權威的反抗者、積極的改革論者，經驗是解放的力量，它能「令我們拋棄過去的執著，示我們以新的事實和真理……而與經驗相反的理性則是保守的、奴視的。」¹⁷因此，對於杜威這樣的觀點，顧準在日記中寫下：「讀杜威哲學的改造，極有意思。……明快清晰，極愜我意。」¹⁸

告別理想主義之後，顧準很快地接受了經驗主義。儘管之後顧準因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爆發等環境因素，無暇通過文字來表達他在思想上的起伏轉折。但當時序來到 1970 年代初期，顧準藉由與胞弟陳敏之的來往通信，清楚地說明他的世界觀是如何由理想主義走上經驗主義之路。

顧準延續過去的思路，依舊由馬克思理論的核心——辯證法為切入點進行探討。他引據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辯證法的邏輯》書中觀點指出，狄慈根把辯證法看作「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神學」，然而後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人卻都沒有反對這樣的論點，顧準說：「狄慈根公開把辯證法等同於神學，但是未受『斥責』。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狄慈根不加掩飾地將辯證法神化，等於是公開地襲用黑格爾的『邏輯泛神論』。」¹⁹而在梳理曾被馬克思批判的黑格爾的邏輯泛神論，顧準則是這樣理解的：

按我的理解，黑格爾的邏輯學=辯證法=世界模式論。1.黑格爾的邏輯學，不僅僅是研究思維規律的科學，而是整個世界 - 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總和 - 的秩序和規律的「科學」。這個世界的秩序和規律的特點是辯證的，所以黑格爾的邏輯是辯證的。2.這個世界的秩序和規律的特點是什麼呢？……有兩個主義：（一）真理不可分主義。這就是說，你研究局部事

¹⁶ 靳樹鵬，〈談陳獨秀與顧準〉，《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42 期，1997 年 8 月，頁 146-150。

¹⁷ 杜威（John Dewey）著，許崇清譯，《哲學的改造》（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第四章：關於經驗和理性的已變的因素〉，頁 49-50。

¹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 119-120。

¹⁹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9-290。

物的真理。因為它是整體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孤立研究是發現不了它的真理的。...(二)事物真理性的一元主義，而不是多元主義。這也就是說，真理只有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是不行的。²⁰

顧準對黑格爾觀點的理解與判斷，實則牽涉到西方哲學思想史上的辯論。顧準指出，黑格爾的邏輯學是一種世界模式論，而這個模式的基礎是取自神學的兩條主義，一是真理不可分，二是真理是一元的。而能夠認識此一宇宙真理的是能思維的人，是客觀世界的主人，是神，故辯證法就是世俗神學，其中蘊含著真善一元的理念。然而，康德以其二元論在其中劃下一道鴻溝，以人的理性不可能認識先驗的本質為出發點，區別了知識和信仰、事實與價值、真與善兩大領域，它們的統一只有在上帝那裡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不可知的、無法驗證的。黑格爾則不滿意康德的二元論，他主張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不管是個人意識，還是人類精神，都有自己的歷史階段，都是辯證法發展的過程。因此辯證法是歷史的本質與規律，歷史是辯證法的具體應用。²¹進一步言，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先驗天賦的、唯理主義²²的，唯理主義者本質上不得不是神學家，正如狄慈根所說，理性的領域與神的領域之間，不可避免地是聯繫著的。²³顧準認為，這就是黑格爾所謂的邏輯泛神論。

顧準繼續指出，馬克思儘管在《神聖家族》中批評了黑格爾的泛邏輯主義，但在這對黑格爾唯一的一次批判中，馬克思也沒有抓住三大規律和兩大主義，而只是批評其把概念看得比具體高的唯心主義。探究其因，顧準說：「馬克思按其本性是唯理主義的。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不能不是唯理主義者。」對於意在鼓動革命的馬克思來說，他完整的接受了來自基督教神學的黑格爾唯理主義，因為這對革命的理想主義確實是不可少的。因而，「《神聖家族》才剛寫完，馬克思通過《經濟學—哲學手稿》、《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從否

²⁰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1。

²¹ 單世聯，〈告別黑格爾—從張中曉、李澤厚、王元化到顧準〉，《黃河》（太原），1998 年第 8 期。2009 年 2 月 4 日，取自：<http://www.confuchina.com/10%20lishi/gaobie%20heiger.htm>

²² 顧準在其文章中交互使用「唯理主義」與「理性主義」，這兩個名詞在意義上是相同的。大陸學者顧肅指出，狹義的理性主義在哲學史上常用唯理論相稱，其與經驗論相對，而認為人的知識可靠性的來源只能是理性認識，如演繹推理，而不是感覺經驗。另外，廣義的理性主義既包括經驗論也包括一些唯理論者，其特點是與非理性主義相對，要求認識、立論都建立在可質疑和探究、邏輯思維、可推導或論證的基礎上，而不是訴諸無法論證的、因人而異的直覺或非理性的體驗。若參照顧肅的解釋，則顧準在其文章中所指涉的理性主義（或唯理主義），應是指傳統的認識論上狹義的理性主義，亦即強調一切可靠的普遍的知識和認識不可能來自感性經驗，而只能來自人的邏輯推理，而不是盲信、神秘的體驗、啓示或直覺。參見：顧肅，《自由主義基本理念》（台北：左岸文化，2006），頁 26-27。

²³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2。

定黑格爾又回到了黑格爾。」²⁴

馬克思的哲學擷取了黑格爾的「合理內核」，那就是他的唯理主義。顧準認為：「說得具體一些，是黑格爾的『真理是整體』，黑格爾的一元主義，以及『能思維的人』，『其思維，最終說來是至上和無限的人』，是客觀世界的主人，亦即『神性寓於人性』之中的黑格爾加以哲學化了新教精神。」進一步言，「人是世界的主體，神性寓於人性之中，這個世界是一元地被決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這對於革命的理想主義確實都是不可少的。」²⁵在顧準看來，這樣的理性主義是充滿宗教、烏托邦與理想主義的。

此外，馬克思的理論除了擷取黑格爾的「合理內核」，還加上了培根主義的改造。顧準認為，馬克思哲學當中的唯物論源於英國哲學家培根，而馬克思要用培根主義對黑格爾進行改造。因為，「黑格爾那一套，全是在思辨中進行，在思辨中完成。馬克思根據培根主義的原則，要把這一套從思辨中拉到實踐中來進行，在實踐中完成。」如此一來，馬克思哲學就是黑格爾和培根的「神妙的結合」，這一結合在哲學上導致唯理主義與唯物論的結合，產生了辯證唯物主義，顧準則稱之為「唯理主義的唯物論」。且這一結合的後果是非常巨大的，「從政治上來說，它賦予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以神聖性。從哲學上來說，到此為止的唯物論幾乎都是經驗主義的，唯理主義則是唯心論的。」²⁶言及於此，顧準的結論已昭然若揭：即引導顧準從青年時代就義無反顧投入革命的理論竟是宗教神學，且這樣的宗教性的理論是一元的、排它的。通過這一思考，顧準清理革命的思想遺產，反省中國黑格爾主義的政治後果，實際上完成了告別黑格爾的思想歷程。

就在顧準拒絕辯證法作為絕對規律的同時，也相應地拋棄了歷史決定論。由於黑格爾強調人的理性能夠認識並實踐至善真理，進而論證人有權對社會實施整體性改造，使之符合並趨向歷史的終極目的。因此，當馬克思理論擷取了黑格爾的內核後，可以發現，馬克思所設計的人類的終極目的中含有強大的烏托邦主義，並且形成一種堅定的「歷史決定論」。²⁷至於所謂的「歷史決定論」，按照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的定義：「『歷史決定論』是探討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它假定歷史預測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目的，並且假定可以通過發現隱藏在歷史演變下面的『節律』或『模式』，『規律』或『傾向』來達到這個目的。」²⁸顯然，若按照庸俗化的馬克思主義說法，人類歷史殊途同歸，必定都會經過固定的進化階段，並且最終指向人類未來的美好圖景。那麼，馬克思主義是相當符

²⁴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1-292。

²⁵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3。

²⁶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293-294。

²⁷ 單世聯，〈告別黑格爾——從張中曉、李澤厚、王元化到顧準〉，《黃河》（太原），1998 年第 8 期。2009 年 2 月 4 日，取自：<http://www.confuchina.com/10%20lishi/gaobie%20heiger.htm>

²⁸ 卡爾·波普（Karl R. Popper）著，杜汝楫、邱仁宗譯，《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頁 2。

合上述所謂「歷史決定論」的定義的。然而，對經過一番思想理論探索且拒斥邏輯法的顧準，他認為：「所謂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終極目的的絕對真理論，來自基督教。所謂按人的思維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終極目的的絕對真理論，來自為基督教製造出來的哲學體系，黑格爾體系。」²⁹

於是，在否定理性之上的絕對、必然和一元後，顧準在人生後期走向經驗的相對、或然和多元。但面對原先所信仰的思想體系就此瓦解崩潰，顧準告訴陳敏之：「我轉到這樣冷靜的分析的時候，曾經十分痛苦，曾經像托爾斯泰所寫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我還發現，當我愈來愈走向經驗主義的時候，我面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我面對它所需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於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氣。」³⁰

回顧顧準思想轉變的歷程，顧準由反教條主義信念開啓他的反思之路，爾後透過閱讀大量的西方經典哲學著作，利用歷史事實來檢視、驗證馬克思理論，最終直指馬克思主義背後的神學幽靈，並且轉而成爲經驗主義的擁護者。然而，當顧準在總結從柏拉圖至列寧的哲學剖析，倒也提出一個很中肯的心理分析，他說：「唯理主義者，尤其是革命家們，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唯有堅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他們才心有所安。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青年時代的顧準正是基於這種道德哲學的信仰才投入共產革命，只是面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亂象，當他看到「今天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他堅定地說：「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³¹

第二節 經驗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內容

前文主要說明顧準的思想突破和他走向經驗主義的思想歷程，如何由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爲一個充滿批判精神的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³²同時也看到他衝破當時控制中國人思想的意識形態，走上經驗主義的立場，進而形成自己的經驗主義世界觀。而這樣的世界觀具有兩大核心內容：一是多元真理觀，二是進步信念。

壹、多元真理觀

²⁹ 顧準，〈一切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論都是相對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6。

³⁰ 顧準，〈一切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論都是相對的〉，頁 286-287。

³¹ 顧準，〈辯證法與神學〉，頁 303。

³² 周鐵水，〈從虔誠的朝聖者到批判的勇士－論顧準的思想成因及轉變〉，《二十一世紀》網路版（香港），總第 48 期，2006 年 3 月。

顧準在文革期間與陳敏之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及自己的「多元主義」，並且視其為一種「科學精神」，他所下的定義是：「哲學上的多元主義，就是否認絕對真理的存在，否認有什麼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類的什麼終極目的。……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終極目的的設想，都應該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終極目的，則恰好是哲學上的一元主義和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的根據。」³³顧準進一步指出，「多元主義」含有五種元素：

1. 承認人對於自然、人類、社會的認識永無止境。
2. 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
3. 這些知識，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4. 每一門知識的每一個進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過程。前一時期的不完備的知識 A，被後一時期較完備的知識 B 所替代，第三個時期的更完備的知識，可以是從 A 的根子發展起來的。所以正確與錯誤的區分，永遠不過是相對的。
5. 每一門類的知識技術，在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統治的權威性的學說或工藝制度，但大家必須無條件地承認，唯有違反或超過這種權威的探索和
研究，才能保證繼續進步。³⁴

上述的「多元主義」實質上就是顧準的多元真理觀。他認為，早期的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總是隱含一種「終極論」，於是說：「人類是萬物之靈，人是由上帝創造出來，人類的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地上的天國。」但顧準主張一種「進步論」或「改善論」，即現在的人們所要認識的是：「人，通過世世代代的努力，一點一滴的積累，他的處境改善了，還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沒有止境的。」因此過去的「終極論」應該被現在的「進步論」所取代。³⁵

此外，顧準的多元真理觀亦具有平等的意涵，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既

³³ 顧準，〈科學與民主〉，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35。

³⁴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4。

³⁵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5。

然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沒有尊卑貴賤之分，那麼，「所有的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唯理主義、經驗主義，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類思想，都曾經標誌著人類或一部分人類所曾處過的階段，都對人類進到目前的狀況做出過積極的貢獻。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動過思想鬥爭，而沒有思想鬥爭，分明沒有進步。」³⁶因此，顧準認為所有知識在人類歷史上都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其次，顧準從他反思的歷程中發現，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有缺陷與不足的，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學說或理論可以被視為終極的真理。

貳、進步信念

一般而言，現代的進步觀念是一種關於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歷史過程的看法。它把人類社會按過去、現在與未來做一個線性的時間的處理與排列，進而相信後一個時間段上的人類社會要優於前面的。這一觀念產生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啓蒙運動期間，聞名於當時的思想家孔多賽（Condorcet）在其著作《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提出「人類不斷進步」的歷史觀念，並成為西方歷史哲學中「歷史進步觀」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張，現代進步觀念應包含六大要素：一、進步發生於一切領域；二、伸展於未來；三、反對不可避免的毀滅以及與此相伴的悲觀主義；四、文明是可以無限完善的；五、擁有一種線性史觀；六、把未來看作是某些可以計算的不可避免的模式。³⁷很顯然地，這樣的定義是建立在當時人們的理性主義基礎之上的，反映出樂觀而美好的預期心理，正如孔多賽所言：「人類精神在解脫了所有這些枷鎖，擺脫了偶然性的王國以及人類進步之敵的王國以後，就邁著堅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進。」³⁸及至黑格爾，更主張理性是克服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實現兩者的辯證同一，達到真理性認識的根本力量。他說：「理性出現在世界上，具有絕對信心去建立主觀性和客觀性的同一，並能夠提高這種確信使成為真理。」³⁹正因為人類知識的不斷積累、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人類歷史自然也不斷地在進步著。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便曾如此形容人類知識的積累必將導致進步的信念，他說：「人生的短促只能容許個人走一短的距離，但是，雖然每一世代所可做成者甚少，可是，若干世代，接著他們的前人的發明，可以逐漸改善人類的狀態，正如珊瑚蟲，把這一世代建立在其他一世代的工作上，逐漸由海底之下增高他們自己的地位一樣。」⁴⁰

近代中國對於進步的信念是從接受達爾文的進化理論開始。基本上，中國近

³⁶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5-236。

³⁷ 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著，呂文江譯，《進步的幻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19-20。

³⁸ 孔多賽（Condorcet）著，何兆武、何冰譯，《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204。

³⁹ 黑格爾（G. W. F. Hegel）著，賀麟譯，《小邏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410。

⁴⁰ 佐治亨利（Henry George）著，樊弘譯，《進步與貧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第十編 第三章：人類進化的公律〉，頁 89。

代提倡進化論者都會將達爾文相提並論，而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則是與嚴復翻譯、介紹赫胥黎的《天演論》分不開的，根據汪暉的研究指出：「嚴復的《天演論》並非是一個直線的進化信仰的論調，它包涵了進化與循環的雙重特性。」⁴¹不過，對處在時代動盪與民族存亡關頭的中國人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後來取代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原因有二。第一，它更為具體地解釋人類的歷史，不再是一個相當簡單的生存競爭原則或比較空泛的社會有機體觀念，而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基礎來解釋社會的存在和各種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觀念體系以至風俗民情，具有很強的理性說服力。其次，中國社會思想中一直有烏托邦的傳統，以空想社會主義為自己現實奮鬥的最終目標和遠大理想，一直是中國志士仁人進行實踐鬥爭的一種巨大的原動力。⁴²

綜上所言，進步觀可以說就是一種歷史觀。通過進化論，近代中國人迅速地扔棄千百年「一治一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環論的歷史觀和「復三代之盛」的歷史退化論，轉而接受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的進化論歷史觀，張灝即稱之為「歷史理想主義」。⁴³而顧準的進步觀最初也是源自他接受這一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他對進步的觀念就如同孔多賽一樣對未來充滿了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也正是這一對歷史發展的進步信仰，才使得顧準最終無視於事業和社會地位的一帆風順，而投入到共產主義的革命道路上，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言：「真正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九一八以後的民族危機，是挽救中國危亡的要求和社會主義前途的憧憬兩者的結合。」⁴⁴

然而，如果說青年時代的顧準是因歷史主義進步觀的信念而投身革命的話，那麼，當他在 1950 年代末期由理想主義走上經驗主義，由絕對真理觀走上多元真理觀，過去那種樂觀的歷史目的論的進步觀亦將產生質變。根據顧準日記的記載，顧準由理想主義的進步觀轉為經驗主義的進步觀的時間大約是在 1959 年的 3 月間，時值大躍進運動正浩浩蕩蕩在中國席捲開來，在 3 月 8 日的日記裡，他寫道：「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麼地上天國。」⁴⁵顧準此時對進步的信念與過去的差別在於：在歷史目的論的支撐下，相信人類發展必然會朝向一個以「天國」為目標的理想邁進，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進步觀；但如今在經驗的基礎上，則以人類知識的增長為憑據，相信「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在人類知識的寶庫中添加一點東西。」而人則是「通過世世代代的努力，一點一滴的積

⁴¹ 汪暉，〈嚴復的三個世界〉，載於汪暉著，《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一部（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833-843。

⁴² 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載於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455-517。

⁴³ 張灝，〈再論中國共產革命思想的起源〉，載於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1992），頁 55-62；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52 期，1999 年 4 月，頁 29-39。

⁴⁴ 顧準，《顧準自述》，頁 20。

⁴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0。

累，他的處境改善了，還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沒有止境的。」⁴⁶

當這樣基於經驗主義之上的進步信念確立之後，使經歷了一連串打擊後陷入失望的顧準重新看到希望，他說：「弄清楚了歷史的發展方向，把憤慨轉為觀察，失望轉為希望。」⁴⁷儘管，此時的顧準已得知將要再次被安排下放到農村勞動，且未來一年的商城生活將會是他人生當中身心最為困頓的一段時期，但他的日記仍舊充滿著希望、樂觀的筆調，他說：「中國的歷史真是迅速無比！地土多潤濕，豐收有希望。」且爲了明天要啓程前往商城縣，更說：「準備好好睡覺。」⁴⁸

自 1959 年下放商城勞動起，顧準的生活大多被勞動改造和思想批判所填滿，但當顧準熬過饑荒回到北京後，在思考未來之時，他仍堅持進步的信念，他說：「二三年來困惑不定的問題，有了一個趨向了。煩躁之感已逐漸減少，可以安定下來做我的事，走我的路。現在還是本錢不足，所以一定要讀。」⁴⁹文化大革命期間，顧準堅信只有等待，進步終將取代現在的動盪，並且告訴自己：「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何必不等呢？要等，就要堅毅，脆弱是不行的。」⁵⁰即便是他即將離開人世，他仍勉勵友人，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所以要繼續研究工作。⁵¹

顧準在回首這段思想轉向的歷程說：「曾經十分痛苦。」且處在「無信仰而無所依憑」的徬徨當中，⁵²但若沒有徹底檢視並批判原先支配自己思想的先決觀念，勢必無法從舊有的思想框架中跳脫出來。因此，當顧準建立起經驗主義的世界觀，多元真理觀讓他的思想內涵更加豐富；對進步的堅定信念，則不致讓他在政治風暴中思想繳械，從而能用更積極的態度展開大視野、溯本尋源的反思。

⁴⁶ 顧準，〈科學與民主〉，頁 234-235。

⁴⁷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1。

⁴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 128-129。

⁴⁹ 顧準，〈顧準日記〉，頁 262。

⁵⁰ 顧準，〈顧準日記〉，頁 410。

⁵¹ 邢小群，〈思想使人受難，受難使人思想—吳敬璉談顧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頁 350-361。

⁵² 顧準，〈一切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論都是相對的〉，頁 286。

第三節 「出走娜拉」大不同：魯迅與顧準之間命題的差異

1952年三反運動中無預警的撤職，象徵著顧準人生志向的重大轉折，即從官場走進書齋，並由此開啓了顧準的反思歷程。基於過去會計專業的出身，顧準的學術興趣最早是經濟研究領域，1956年，顧準針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問題發表長篇論文《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以下簡稱《試論》），該文提出了一個與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相對立的新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並且論述這種新的體制的運行原則。不過，這篇論文與其說是經濟論文，倒不如說它是「政治」論文，因為它的問題意識源於對以往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進行的反思，並提出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應該實行何種經濟體制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說是顧準進入「娜拉出走」命題的開始。自此之後，他所有的理論觸角都是為探索問題而發，都指向一個尖銳的聚焦點：「娜拉出走以後怎樣？」

「娜拉」原是挪威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於1879年創作的戲劇《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劇中的女主角娜拉因為發現丈夫對她的愛全然虛偽，而自己在家中就像處在「玩偶」的地位，於是她毅然告訴丈夫：「不管法律是不是這樣，我現在把你對我的義務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你的拘束。雙方都有絕對的自由。」最後，就在娜拉離家出走的「砰」的關門聲中結束此劇。該劇通過一對夫婦從虛偽的和諧到尖銳對立的故事，可以說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婚姻問題、家庭生活、婦女地位以及倫理道德做了深刻的探討，並且揭露了男權社會與婦女解放之間的矛盾衝突。⁵³

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易卜生及其劇作在中國就已引起不少知識分子的注意，不僅出現了關於易卜生的專論、作品翻譯，還上演過易卜生的戲劇，惟當時引起的迴響並不深廣。1918年6月15日，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刊物《新青年》刊出「易卜生號」，刊載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袁振英的《易卜生傳》（第一篇中國人所寫的易卜生傳記）、易卜生的戲劇《娜拉》（即《玩偶之家》，羅家倫譯第一幕、第二幕，胡適譯第三幕）、《國民之敵》（即《人民公敵》）、《小愛友夫》，還載有「壯年之易卜生」塑像和易卜生手跡等。就在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促進者們的大力引薦下，「娜拉」在中國迅速地走紅，並且成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⁵⁴

《新青年》大力宣揚「娜拉」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有意識的行為。新文化運動向來被視為是中國的啓蒙運動，係因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日益走向民眾所期待的反向的現實政治情況的刺激而生，運動的主旨則是要喚醒中國人投入

⁵³ 易卜生著，潘家洵、黃雨石、南江譯，《易卜生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出版前言〉，頁1-39。

⁵⁴ 同上註。

參與現代性國家的構建。不過要達到這一目標，前提是先解決兩大問題：一是當時中國民眾的基本智識和精神狀態問題。爲了改善民智、培育新民，新文化運動的促進者們發動白話文運動、改造國民性運動，除了訴諸對舊有文學風格的揚棄之外，更重要的是打破過去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藉此解決民眾智識、精神問題；⁵⁵二是家族對個人的絕對控制問題，故主張發起全盤性反傳統道德與文化運動，藉以解構「家」對個體的人的控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進而把個人解放出來，參與到現代國家公共政治的建構中去。⁵⁶是故，家就成爲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極力解構與否定的標的，而脫離家的控制去獲取個人自由的行爲遂被賦予奔向光明、獲取解放的意義。又根據學者劉禾的研究指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個人主義」話語扮演一種把個人「從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傳統關係中『解放』出來，以便使國家獲得個人的直接、無中介的所有權」的「解放者」的角色，易言之，五四時期應運而生出一種「個人主義」話語，但其目的實則爲了建構現代性社會和國家的現代性活動。⁵⁷

然而，既然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們已構畫出中國「娜拉」出走後的道路與歸宿，也就是走出「家庭」並且參與建設現代國家與社會的方案中去，可是爲何身爲該運動中一員大將的魯迅還要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命題呢？1923年12月26日，魯迅對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講，鑑於當時易卜生《玩偶之家》之風行，講題就定爲〈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在其演講中將「娜拉」區分爲兩種類型，一是普通人物的「娜拉」，對於這一類「娜拉」的命運，魯迅說只有兩種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而若要成功出走，只有依賴於社會成功的出走後才有可能；⁵⁸第二類的「娜拉」，其出走則是爲了社會大眾而情願做犧牲的「革命」的「娜拉」，對於這一類「娜拉」的命運，魯迅呼籲：「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但若有革命者願意爲大眾做出犧牲，值得嗎？魯迅一針見血地答道：

⁵⁵ 格里德 (Jerome B. Grieder) 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 (1917-1950)》(淮安：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頁 80-82。

⁵⁶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 45-51。

⁵⁷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123-134。

⁵⁸ 此處所指的「社會的成功出走」，是有鑒於當時中國民眾普遍存在著基本智識和精神落後的問題，魯迅認爲，唯有先仰賴社會群體的出走（亦即改善民智，培育新民），個人出走（無論是在家庭觀念或政治參與等方面）方有成功的可能。因此，當時的新文化運動提倡者遂發動白話文運動、改造國民性運動和反傳統道德與文化運動，試圖用白話文運動、改造國民性運動解決民眾智識、精神問題；用全盤性反對傳統文化與道德來解構傳統社會對個體（人）控制的合法性，以期把個人解放出來，投入到現代國家公共政治的建構之中。參見：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載於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441-488。

群眾 - 尤其是中國的 - 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艱棘，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舖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⁵⁹

置身在當時唯革命是尚的社會氛圍，魯迅這番話無疑潑了處在高昂激情之中的民眾一桶冷水。畢竟，在魯迅看來，革命的血是流得太多了，他認為與其去做「驚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顯然，魯迅是希望革命者無需用犧牲來喚醒社會，因為這種犧牲只會成為群眾看戲的材料，而是要透過平凡而持久的「啓蒙」（戰鬥）來改變社會，唯有如此才是出走（革命）的正道。

綜上所言，魯迅對於「革命娜拉」出走後怎樣所思考的答案，就和他對「普通人物娜拉」所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即沒有「社會/群體」的「娜拉」的出走，「個體」的「娜拉」的出走只不過是做無謂的犧牲，終究是無法成功的。⁶⁰至於顧準所提出的「娜拉出走」命題，正如前文所曾提及，1956年顧準寫成《試論》，可以說是顧準進入此一命題的開始，不過，他對此一問題之發想與魯迅有所不同的是，當背景設定在「已經出走的娜拉（社會）」，且革命成功以後的社會和國家已經處於重大問題之中時，緊接著下一步該怎麼走？

由顧準的學術思想的生成與發展來看，撰者以為，應將顧準的思想定位在「反思」的類型。⁶¹又從內容與時間來看，顧準的反思首先是從經濟領域開始，在蘇共二十大的衝擊下，顧準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和體制進行了系統性的反思，其代表性成果即為《試論》。自此之後，顧準就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進行反思，而這個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的思考可以說貫穿了顧準的一

⁵⁹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載於魯迅著，《墳（1907-192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 127-134。

⁶⁰ 林達，〈「美國娜拉」的出走〉，載於林達著，《總統是靠不住的：近距離看美國之二》（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18-39。

⁶¹ 學者徐友漁認為，顧準的關注和思考具有整體性和根本性，他的思想始終緊扣著「娜拉出走以後怎樣？」（即革命成功後怎樣？）的問題，而這可以說是當代中國問題之結，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皆集結於此。此外，顧準的思想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性，在於他是革命隊伍中人，他所親身參與的革命解決「娜拉出走」，即奪取政權的問題，但緊接著出現當初革命的目標是達到了、近了還是遠了的問題，而這也正是顧準自中共建政之後仍舊堅持學術探索的思考原點。因此，藉由徐友漁的觀點，若將顧準的學術思想定位在「反思（革命）」的類型應是合理的。參見：徐友漁，〈當代中國思想史的華章〉，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錄》，頁 59-6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文革結束後，對中國革命的反思可以說是中國學界所關注的焦點，且進入到 1990 年代，更是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若從時間點來看，則顧準對革命的反思是比較早就開始進行了。

生。至於其最早進行反思的時間點，如果以顧準 1955 年《黨校日記》中歌頌讚揚革命的話語內容為分界，在 1956 年以前，他對中共所領導的革命及新中國的建設是充分正面肯定的態度，亦即在 1955 年秋季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前，他是不可能對中國革命開始進行深度反思的。

基本上，顧準對革命的反思始於他對共產主義經典作家理論書籍的閱讀。1955 年顧準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後，開始系統閱讀馬恩列斯等人的著作，也開啓了他對於革命的思考。1955 年 11 月 2 日，顧準在其日記中把世界已發生的革命概括為兩種類型，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類型和二戰後的人民民主專政類型，並設想是否能有第三種類型，即在社會主義陣營力量日益強大的情況下，通過和平的方式取得革命的勝利。⁶²12 月 8 日，他又思考革命中心何以由西歐「轉移到俄國、轉移到東方」的原因。⁶³而隨著對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西方經濟學理論尤其是凱恩斯經濟學的逐步學習、了解，顧準對於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界無視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已發生深刻變化的事實，卻依舊照搬馬恩列斯等著作中的論斷來論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資本主義死亡的現象，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與批判：「面對著目前資本主義國內的實踐與理論，怎能以一個不變的教條：列寧關於國家是專政的工具，與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競爭與無政府狀態，而對這些大量存在的事實，閉目不視，充耳不聞，深閉固拒呢？」⁶⁴基於對馬克思後及至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了與以往不同的認識，顧準的革命觀念和激進思維漸不復存。例如談到二戰後的亞非國家反帝國主義的勝利，顧準認為，這既有社會主義類型革命的勝利，也有資本主義類型革命的勝利。⁶⁵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多元主義的視角下，顧準對於各種類型的革命亦抱持著肯定的態度：「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些革命雖然不徹底，但同樣改變中國的面貌，各自推動了其後中國歷史的發展。」⁶⁶

儘管青年時期的顧準對於革命是抱持讚美與認可的態度，但從其 1956 年後的思想歷程來看，並不代表他就此認同革命後的現狀。事實上，顧準反思革命的著力點並非「中國要不要革命」的問題，而是「革命後怎麼辦」的問題？基於對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制度及實踐的研究和反思、對 1949 年來中國經濟建設的反省，顧準寫下《試論》論文，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市場取向」。顧準提出這一回歸到現代經濟體制軌道上觀點之發想，源自於蘇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所出現的嚴重問題，其近四十年來（1913—1955 年）以犧牲農業、輕工業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使農業的經濟水平在相當長時期內低於

⁶² 顧準，《顧準日記》，頁 16。

⁶³ 顧準，《顧準日記》，頁 25。

⁶⁴ 顧準，《顧準日記》，頁 60-64。

⁶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 76。

⁶⁶ 顧準，《顧準筆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 535。

沙俄水平，農村更出現大量的非正常人口的死亡。⁶⁷為何社會主義的模範——蘇聯會出現這種情況？要如何解決這一危機？可以說，顧準的《試論》就是要從理論上來解答問題。另外，這篇論文的目的也是一篇探討「娜拉出走後——經濟制度該如何安排」的學術文章，表明顧準已進入「娜拉出走」的命題了。

1957年11月，顧準沒能在反右運動中倖免於難而被打成右派，同時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這一變故使顧準的研究重心發生轉向，經濟問題的研究儘管在日後仍一度涉及，但政治自此成了關注的焦點。這一轉向是與顧準在隨後四年裡的勞動改造經歷息息相關的。1957年11月至1961年11月間，顧準先後被下放至河北贊皇縣、河南商城縣、北京清河農場等地勞動改造，在這將近四年裡的勞動生涯中，尤其屬商城縣的生活最為困頓煎熬，他的《商城日記》更可以說是記錄中國大躍進運動造成民不聊生、農村悲慘的日記，面對這樣的景象，他認為並非全然是自然災害的產物，而是人為推動下的錯誤政策，這使他不得不去探究，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對商城見聞的深刻印象長期不能忘懷。」更因這樣無法忘懷的記憶，使他無法面對同時期建造的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建築——人民大會堂的「輝煌」，進而立誓：「此生不進人民大會堂。」⁶⁸於是，儘管面臨饑餓的威脅、疾病的折磨，他決心要：「哀鴻遍野，我努力求飽，有些說不過去。但我要恢復我的精力，節用我回京的時間。我還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還要戰鬥。而這個戰鬥不會是白費的，至少應該記下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後來者一個教訓。」⁶⁹

1956年後中國局勢的變化，促使顧準從理論思想上去追尋革命後中國何以會演變如此狀況的原因。顯然，他認為這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實際上，顧準在去河南商城之前，即他由河北贊皇勞改回到北京之時，他的探索重心就已經轉移到政治方面。他在1959年2月23日的日記中，指出當前在思想上需解決的幾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政治——哲學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歷史問題……第三個問題，最不重要的問題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⁷⁰商城的經歷無疑更加深了顧準評估政治問題的重要性。顧準在政治問題上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的政治體制建構方面。早在1966年前，顧準認為中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就是「斯大林主義」。在顧準看來，1949年以來中國出現的種種弊端是與這個主義直接相關的，但要如何避免呢？由於斯大林主義能夠實行是與一黨專政的政治生態相關聯，據此，他提出的論點是：「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地上天國，矛盾永遠存在，鬥爭永遠存在，而鬥爭的方式，那老一套的『正確錯誤』的絕對論維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見的人們必定要組成不同的社團，發展的結果必

⁶⁷ 為了釐清並說明問題，顧準根據資料制定了蘇聯四十年（1913-1955）的有關農業方面的數字表格。參見：顧準，〈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3-26。

⁶⁸ 顧準，《顧準自述》，頁263。

⁶⁹ 顧準，《顧準日記》，頁227。

⁷⁰ 顧準，《顧準日記》，頁100-102。

定是多黨制度。」⁷¹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這段期間因實行的是一種以「大民主」為表現形式的直接民主，它既未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卻又帶給中國政治經濟極大破壞，為此，顧準提出在現代國家中，民主的實現方式只能是間接民主，而不可能是直接民主。⁷²

總結之，顧準所探究的國家、社會這個「娜拉」出走後怎樣的一個大哉問，其主要包含兩個核心命題，即在革命成功後應該建立怎樣的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問題，易言之，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應該建立怎樣的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問題。而他的反覆思索所得到的解答是：在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在政治上則是貫徹民主理念，推動以多黨制、間接民主制為核心內容的現代民主制度。

第四節 對群體革命和解放問題的反思與解決之道

顧準所提出的「娜拉出走後怎樣」命題，目的在探索革命成功之後，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上應該怎樣設置才能確保社會的正常發展。對此，顧準得出的答案是：「只能經驗主義地解決。」⁷³而依據經驗所得出的具體方案，他的主張則是：在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上實行現代民主制度。顧準透過經驗歸納而來的結論，看似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實踐方式之間，選擇回歸到資本主義的道路。然而，若時間回溯到 1970 年代初，也是顧準生命的最後幾年，在他與陳敏之的信中討論到社會主義與民主問題時，卻又自問自答的表明自己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我反社會主義嗎？我不。」⁷⁴那麼，當顧準在探索群體革命和人類解放問題，在面臨所謂「姓資姓社」的抉擇之時，其確切的態度究竟為何？將是本節所探討的重點。首先，要從顧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開始談起。

顧準對資本主義的研究是從 1955 年黨校期間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啓的。由於對於經濟方面的專業和興趣，加上黨校課程安排使然，1955 年 11 月，顧準開始閱讀《資本論》，且立即被其學說深深吸引：

今天又讀了《資本論》的四、五、六三章。……真好呀！馬克思對工業過程的技術經濟過程的總括的研究，對各種經濟型態，一直到古代社會的經濟的分析，對資本家的憎恨，與對工人階級的愛，對鐵的法則的科學的冷

⁷¹ 顧準，《顧準日記》，頁 261。

⁷²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42-255。

⁷³ 顧準，〈一切判斷都來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論都是相對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6。

⁷⁴ 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56。

靜的態度，淵博的知識，美麗的文章(不很好地讀，還看不出文章的美麗)，真是使資本論是政治宣言，科學著作，與文藝作品。而由於他對第一卷曾經費去那麼多的勞動，比之他生前來不及校正再寫完成的第二、三卷，更是精美絕倫。遠的不談，1949年以來的幾年中，不好好的讀這樣的好書，在上海，在北京，在洛陽都是盲目積極，實在滑稽。⁷⁵

在《資本論》的理論吸引下，顧準逐步展開他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比較研究，也走進了思考「娜拉出走」即人類解放的命題之中。

馬克思主義學說係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工人運動實踐基礎上而創立的理論體系，透過其哲學核心——歷史唯物主義的闡述，主張歷史發展是客觀且有其特定規律的，最基本的規律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將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而在這一歷史必然進程的模型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就是資本主義的誕生、滅亡及至社會主義的建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認為，人類為謀求自由與解放的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障礙為自然的束縛與階級的壓迫，儘管工業革命的誕生與發展使人類脫離束縛成為可能，為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曾給予高度的評價；但資本主義所衍生的階級壓迫不僅使無產階級無法擺脫壓迫，在馬克思所提出的剩餘價值理論觀點中，更批評勞動的付出沒有得到同樣的回報，剩餘價值被沒有付出勞動的「資本」所剝削。最後，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和產品的社會化必然會導致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並由此否證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若回顧資本主義及所屬國家的發展演變，將發現一個與馬克思主義邏輯推理相悖的事實：資本主義國家仍在最早產生的國家中存在著，資本主義危機雖不可避免，但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應該在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相反地，革命的勝利是在資本主義成分較少的國家中所取得的。面對這一歷史事實，顧準將這個問題稱為「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生命力何在」⁷⁶的問題。顧準透過《資本論》進入對資本主義研究，結合列寧帝國主義的相關論述和戰後資本主義現況，他開始思考現代資本主義出現了什麼變化：「馬克思期望的社會主義是要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實現的。這個預言，本世紀初愈來愈不合乎事實，於是有列寧的『發展』。列寧的發展未被證實，1929年的經

⁷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22-23。

⁷⁶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231。

濟恐慌，又使人們回到馬克思，所以有 30 年代『國際』的資本主義總危機之說。現在事隔 40 年，1929 年那樣的恐慌一直沒有再現，而且似乎也不會再現，原因何在？」起初，顧準認為資本主義是「靠殖民地來克服危機的」，⁷⁷很快，他就認定這個論斷是錯誤的，他解釋：「資本主義本身沒有什麼生命力了，只靠殖民地來維持了，這不是事實。最強大的美國，殖民地占其收入的『份額』是不大的。」因此，他主張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去尋找根本原因。至於內因當時有此一說，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能爆發是因為「工人貴族的腐蝕作用所致」。但顧準認為，這種論點的證據並不充分，所以是不對的。⁷⁸

隨著對資本主義研究興趣的日益濃厚，加上理論學習的程度逐漸加深，在 1956 年 3 月的日記裡，顧準指出，馬克思以後特別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出現很多新的現象：「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飛速提高的結果，資本家爲了推銷製品，有必要提高工人生活，因而絕對貧困化，在若干情況下恐怕值得考慮。」另外，「凱恩斯經濟理論被看做資本主義治病的治標辦法，但它也表明，資本主義在每一次大事變中都在學習，也有在根據經驗教訓改正他們自己的工作。」而在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進行大量技術革新，出現新的技術革命，是否意味著「出現一個多少是新的時代呢？這對資本主義又將發生些什麼影響？」⁷⁹顧準在分析兩極世界格局的形勢下，蘇聯的存在、反殖民統治的浪潮，「使美國在援助落後地區計劃上實行實質性的援助開發。」那麼，該如何看待西方帝國主義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在顧準看來，這些變化與現象已超出過去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論斷，因此他主張：「我們的問題是科學地論證這些現象，而不是深閉固拒地不加理睬。」⁸⁰

顧準在黨校時期除了精細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外，也開始尋找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理論的書籍來補充、比較，例如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⁸¹而透過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研究、分析，在 1956 年，顧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遂得出以下結論：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現況表明，資本主義生產力仍然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得到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人有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論斷已不符合當代的客觀事實。探究其因，係由於自 1929 年經濟大恐慌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職能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增強，隨著凱恩斯經濟學說在理論方面對這一政策的論證，二戰後這種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得以進一步強化。⁸²在這之後，顧準持續注意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動態發展，到了 1960 年代，他不僅翻譯了前文曾提及美國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的《資本

⁷⁷ 顧準，《顧準日記》，頁 49。

⁷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 61-62。

⁷⁹ 顧準，《顧準日記》，頁 61-62。

⁸⁰ 顧準，《顧準日記》，頁 64。

⁸¹ 顧準，《顧準日記》，頁 20-26。

⁸² 顧準，《顧準日記》，頁 72-73。

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的《經濟學論文集》，還認真讀過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蓋布列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⁸³的《富裕社會》等等著作。通過這些當代西方經濟學著作，顧準不僅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理論，亦對資本主義現狀有詳細的觀察。正是在此一知識基礎上，1970年代初，顧準方能在與陳敏之的通信中娓娓道來自己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觀點，其中主要表現在《顧準文集》所收錄的〈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篇文章。

到了1970年代，顧準基於自1956年來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觀察和了解，提出以下結論：現代資本主義變了，它還在繼續發展，危機雖然存在，但大的恐慌性的危機已不復見。對於這一論定，顧準在此時總結出較為全面的解釋：一是西方國家接受德國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英國凱恩斯兩位經濟學家的理論，採取國家干預經濟的方針，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主張用「赤字財政、公共工程」來對付經濟恐慌，於是「把19世紀上半期開始的資本主義周期危機的問題『解決』了。」二是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材料的研發製造，這些事物的出現，「在經濟上的意義就是它比老東西成本便宜，生產它可以賺到大利潤。這種便宜的新東西的不斷投產，也使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和生產總量不斷增多，這就使資本主義老是在發展成長。」三是大公司、大政府和大工會的發展。其中尤以大工會最為關鍵，因為「大工會使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得以維持一定的比例而不下降，它幫助資本主義解決消費不足的危機。」且因其「是資本主義結構的組成部分，幫助資本主義消弭恐慌。」四是多元主義哲學、學術自由和民主政治。顧準認為這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它們的實施最終就是導致批判政治權威，甚至「任何既得權利都是批判對象」，而一切異端思想都得以生存，一切病症都被暴露出來，「這樣，就呈現一種奇觀，資本主義是一大堆罪惡的根源，可是這一大堆罪惡不斷地被揭發，不斷受到注意，老是在作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於是，它雖然『氣息奄奄』了，卻老是混下去了，有的時候還顯得頗為活躍。」⁸⁴

顧準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生命力何以存在的解釋，就某種程度上來說代表兩種意涵，一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正面肯定；另一則是對社會主義體制的負面評價，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目前那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

⁸³ 美國經濟學家蓋布列斯的最大貢獻在於改變好幾代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他不斷憑藉犀利的筆鋒把學院知識大眾化，在一般媒體寫文章，並出版了數本在許多國家的大眾書市都很暢銷的著作，如《富裕社會》、《不確定的年代》、《自滿年代》等。他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中主張，不受節制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帶來公共利益。他嚴厲批判大企業對於社會和市場的過度控制，強調私人財富的過度累積會犧牲公共利益，深信國家必須在市場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呼籲環境與資源保護和完整社會福利的重要。參見：張鐵志，〈公共知識分子的實踐：蓋布列斯的政治經濟學〉，載於張鐵志著，《反叛的凝視：他們如何改變世界？》（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7），頁97-101。

⁸⁴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228-232。

沒有邏輯上嚴整性的。」⁸⁵在政治方面，斯大林主義橫行，而中國現在所走的政策路線正是斯大林主義。論述至此，以顧準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體制間的比較、評價，他最終的選擇應該是很清楚的了，但為何顧準仍直言自己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呢？撰者以為，可以從他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文探知其論點。如上文所述，顧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提出四點解釋，對於這些解釋，顧準認為屬於內在因素，還有一個外在因素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文，顧準指出，經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亦即實質上是中美兩國的較量之後，美國帝國主義因經不起國內消費增長和大量軍事費用的雙重負擔，「於是退卻了」，⁸⁶資本主義才就此發生變化。而顧準分析完現代資本主義沒有衰亡的四個觀點之後，卻又提出應「重新考慮『較量』這句話的意義」，並且說：

無論批判之風如何盛行，美國政治總是維護它的既得利益的。它所以要出兵打仗，就是為了維護它的既得利益。如果打得順利，美國的軍權會煊赫起來，就是說反動氣焰會囂張起來，「批判」的聲音就將會愈來愈微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較量中它沒有占到便宜，才促使進步的批判發展了起來。內外夾攻，它退卻了。所以，較量是不可少的。⁸⁷

顧準這段「重新考慮『較量』意義」的分析是指，由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者間的共存與對抗，帝國主義退卻了，進步的批判於是獲得了認可，進而促使西方資本主義得以向前發展。是故，假設沒有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大的衝擊力量，「西方的資本主義不見得會從帝國主義的道路上退回來，不見得會在其內部產生一股民主福利國家的潮流，至少，這股潮流不會強大到目前那種正在緩慢地改變資本主義面貌的程度。」⁸⁸易言之，顧準這種把社會主義的存在及其與資本主義的競爭，視為現代資本主義發生轉變的外部壓力因素的觀點表明：資本主義並非一種能夠完全自主、自發地為最大多數人謀求福利的機制。且實際上，儘管顧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變化提出了正面的肯定，但就其本質而言，他始終沒有否定任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的弊端與罪惡。在〈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一文中，他如此評論道：「資本主義靠原始積累起家，其初期內部剝削十分嚴重，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資本的每一毛孔都在滲出血汗，這麼說是毫不

⁸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 50。

⁸⁶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頁 223。

⁸⁷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頁 231。

⁸⁸ 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58-259。

過分的。」⁸⁹再者，現代資本主義也是問題重重，「是一大堆罪惡的根源。」因此，當談到資本主義的最終命運，他認為：「資本主義不會通過暴力革命滅亡掉，這是因為它在批判—改良。但是它會在批判—改良中一點一點滅亡掉。」⁹⁰由此可見，顧準並非一味地歌頌讚美資本主義，在仍心存著對資本主義清醒的認知下，他冷靜地針砭現代資本主義的黑暗面，從而使他不可能輕易反對社會主義而投向資本主義的懷抱。

若從顧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的心態來看，撰者以為，根本原因是與他思考人類解放問題，即「娜拉（人類）出走」問題密切相關的。如前文所述，自 1957 年以後，隨著顧準在哲學觀念上皈依經驗主義、相信多元真理觀，並且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更深入的研究，顧準針對群體革命和人類解放等問題，描繪出一種「人類出走」的圖景，而它有一個目標就是「至善」，他說：「『至善』是一個目標，但這是一個水漲船高的目標，是永遠達不到的目標。」⁹¹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顧準明確地指出唯一道路即是：經驗主義。於是，他堅定的說：「『娜拉出走以後怎樣』，只能經驗主義地解決。」⁹²

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分子的顧準，在經歷過 1958 年的大躍進運動、1960 年的大饑荒後，他體認到：「人世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100 年中可以有那麼幾天，一天等於 20 年。要求每天都等於 20 年，是要鬧笑話的，這種笑話我們經歷得夠了。」⁹³根據學者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研究：「經驗主義思想本能地從實踐角度看問題，有著不脫離事實的特點。」再者，「經驗主義的精神是在 *medias res*（事物之間），因此它同能夠看到、觸摸到和加以檢驗的事物十分接近。經驗主義者傾向從現實開始工作。」⁹⁴這對已經走向經驗主義的顧準來說，當他看待群體革命問題時不再是理想主義傾向，而趨向選擇自然演進與改良，斷裂性的革命手段毫無疑問地就此被排除在選項之外。是故，依顧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演進正好提供了一個屬於經驗主義的樣本。儘管，早期的資本主義或許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充滿了罪惡、貪婪與剝削，為了解決這一現狀，由馬克思所創建的共產主義學說即主張透過革命的手段來建立一個新社會。然而，西歐國家並沒有如馬克思所設想般的，通過暴力革命來揮別過去充滿罪惡的舊社會，而是經過批評、改良等自然演進的方式轉型為現代的「民主福利國家」。因此，當顧準對現代資本主義研究所得出對於「資本主義生命力何以存在」的肯定態度，也同樣支持顧準以社會主義為出發點的「娜

⁸⁹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19-220。

⁹⁰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32。

⁹¹ 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頁 259。

⁹² 顧準，〈一切判斷都得自歸納，歸納所得的結論都是相對的〉，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86。

⁹³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51-252。

⁹⁴ 喬·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著，馮克利、閻克文譯，《民主新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57、55。

拉出走」的圖景。

再者，顧準不反對社會主義同時也是與他的現代化思想相關聯的，亦即，他把呈現對立態勢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編寫進入現代化的敘事當中，目的則是在緩解現代兩種制度之爭所帶來的緊張與對立。當代的現代化理論來自西方，以美國學術界為起源地，發展成為二戰後的一種樂觀的社會進化論思潮的產物，也可以說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思潮的一種產物。此一理論在中國的盛行是順應 1980 年代推動改革開放政策而來，不過，現代化的概念卻早在 1930 年代就由中國學術界提出來了。根據羅榮渠的研究，「現代化」一詞，在「五四」以後關於東西文化觀的爭論中，已偶爾出現。而「現代化」一詞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科學詞彙在報刊上使用，則是在 1933 年 7 月《申報月刊》所刊出的「中國現代化問題號」特輯。該編者的目的是「把二十年代以來我國思想界討論過的東西文化觀、東方化與西方化、打倒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振興民族等等問題，都歸結到一個總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問題。」⁹⁵ 關照 1920 至 1930 年代民國的時空背景，「現代化」概念的提出，可以視為試圖調節自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在東、西方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爭論而開闢的新議題，儘管當時中國學界更多的是把它放在文化層面的探討與運用，但它背後所代表的情境和意圖，卻能和戰後現代化理論的產生相呼應，依此而論，顧準關注並使用這一概念的動機亦是與其不謀而合的。

從顧準的日記來看，顧準最早在 1959 年就已使用過「現代化」一詞，他是將「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和「野蠻化的資本主義」做為相對立的詞彙來使用。⁹⁶ 依當時的顧準看來，二戰後的資本主義已然實現現代化，至於社會主義中的現代化問題，顧準倒是沒有在文中提及。撰者以為，以當時顧準仍限於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視為二元對立的思維下，現代化一詞與社會主義無關，並且被其排斥在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意涵之外。進一步言，在顧準的論述當中，現代化的相關內容限定在經濟生產領域，用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經濟發展之類的詞語來表達，而這種表述，表明現代化不過是一種手段，共產主義才是最終的歸宿，或者說是現代化問題的最終結論。然而，隨著顧準在之後對於社會主義的正視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了解，以及隨之而來對兩種體制的肯定與否定，過去在立場上把兩者對立、在發展進程上深信前者取代後者的思維模式開始緊張起來。在這一模式下，既無法認清現代資本主義的真貌，亦無法有效解釋社會主義的現狀，該如何更好地表述和研究現代兩種制度？無疑地，「現代化」一詞的出現與使用或可緩解這一難題與緊張。

⁹⁵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356-357。

⁹⁶ 顧準，《顧準日記》，頁 102。

1959年顧準在日記中使用了「現代化」一詞，說英德兩國已實現了現代化，並且提到「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從上下文的脈絡來看，其中已經充滿了肯定的意味。而到了1966年至1968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喊得震天價響之時，顧準在這段被監管的期間，展開了他龐大的讀書計畫。⁹⁷例如在1968年初，顧準詳讀羅斯托（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在記錄此書的讀書筆記中，受作者的影響，顧準大量使用了「現代化」一詞，並簡約地運用現代化的概念對中國近現代史做了大致的分期。他把從戊戌變法到1950年代視為中國發動現代化的準備時期，他認為：

從戊戌到五四。戊戌時期為辛丑以後大批派留學生做了革命性質的準備。

辛丑以後的留學生發動了五四，使現代化思想及其教育系統植根於中國本土，從而為五四運動開闢了道路。五四為30年代開闢了道路。如果五四是現代化思想植根於中國本土，那麼，植根的結果就是30年代的抗戰……

30年代為50年代的大學、科學研究機構、設計院和現代化工廠的搭架子及其開始運行做了準備。到50年代中期，雖然初搭架子，水平還不高，效率還不理想，已經能夠搞出原子彈和若干國際水平的發明發現了。⁹⁸

在顧準所寫下的這篇讀書筆記裡，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評述現代化產生時提到：

資本主義的興起，這是人類歷史上超越一切歷史事件的最大事件，同時又是歷史中的經濟因素的決定性的變化……要知道，資本主義到底並不僅僅是家庭手工業和包賣商，資本主義只能從蒸汽機和動力紡紗機開始……就這點來說，我很喜歡用現代化這個名詞，免得人們把松江的紗布、景德鎮的陶瓷、聚眾開礦，甚至羅馬以包稅為基礎的金融業都說成資本主義而和

⁹⁷ 顧準，《顧準自述》，頁307。

⁹⁸ 顧準，《顧準筆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305。

近代型的資本主義相混淆。……科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 Newton、Watt 是分不開的。⁹⁹

由這段敘述來看，顯示顧準更趨向用「現代化」一詞而非「資本主義」來表述世界人類歷史過程自英國工業革命展開後與此前人類歷史的不同。此外，也表明顧準此時已開始用「現代化」一詞來論述、研究近現代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與變化，並且隱去過去那種以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道路為論述主體的革命史敘事模式，逐漸發展出超越意識形態框架的研究和思維方式。

於是，當顧準自身發展出把現代化置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上的思維後，他才能主張：「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也是一種現代化方式。」¹⁰⁰這句話表明顧準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有一個新的設定，即社會主義也是為了實現現代性任務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一個與資本主義不一樣的現代化的方式。這樣的思考改變了過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具有時間性與先進性的線性模式，易言之，這些發展模式與選擇是共時性而非歷時性的。到了 1970 年代初期，顧準則是更進一步明確表達此一觀點：

在具備了所有必要條件中好幾項的國家，如英國，產業革命後接受產業革命迅速；而具備條件愈少的國家，接受愈遲緩，接受的方式也顯出大大小小的差異。接受方式，可以分為法國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國土耳其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紀以後，就不再純粹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現代化」問題，可以有資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也可以有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還有 50 年代以後「新興國家」的特殊樣式等等。¹⁰¹

⁹⁹ 顧準，《顧準筆記》，頁 310-311。

¹⁰⁰ 顧準，《顧準筆記》，頁 313。

¹⁰¹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18。

這樣的思維定性，化解了「先進」社會主義和「落後」資本主義在現實發展中呈現反差的巨大矛盾，同時也使得顧準主張不反對社會主義具有合理性。尤有甚者，顧準在上述這篇文章中更直指資本主義衍生的弊端，從而提供非西方國家在追求實現現代性方案時採用社會主義的動機，他說：

要通過資本主義來現代化，必然要鼓勵創業精神和牟利動機，必然要把資本主義的積累看作人類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把社會積累「委託」給資本家。這種積累，資本家有權無限制地加以動用，即使他「忍欲」了，這種積累還可以變成坐收利息不勞而獲的特權。這必然要鼓勵他一方面實行無限制的剝削，一方面把個人生活搞得窮奢極欲。事實上，現在世界上一切新興國家的現代化，都有這麼一個大問題。人類比 200 年前聰明一些，殘害兒童已經不能接受了，所以，新興國家怎樣現代化，資本主義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¹⁰²

當顧準的世界觀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卻又主張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可以說，在其思維體系中，經濟上的市場手段和政治上的現代民主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易言之，撇開姓資姓社的路線爭議，如何邁向現代化才是人類出走的最終圖景，正如顧準所主張的：「我們也不要以為我們的問題全已解決。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麼，哪些沒有解決，哪些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¹⁰³若對照今日中國所實際所推動的政策路線，恰恰驗證了顧準生前所極力主張的正確性，同時也突顯出其思想中的超前性和理性上的認知價值。

¹⁰²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21-222。

¹⁰³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22。